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二〇）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八四期 ——
（二〇〇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406e）

【戏剧人生】小闯将传奇	李萱华
【研究报告】文革漩涡中的38军	余汝信
【人物追踪】《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的沉浮	冯骥良
【史海钩沉】文革中湖南几个红卫兵名人的故事	陈益南
【亡灵祭坛】38条士兵的生命——“珍宝岛”事件余波	佚名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戏剧人生】

小闯将传奇

• 李萱华 •

◇ 小闯将见了大世面

1966年秋，褚仲权小学毕业，刚要升入小沔中学，适逢“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闹革命，他领回一个鲜红臂章，上面写着三个黄色大字“小闯将”，家里人都莫名其妙，学未上到拿来这么一个玩意儿，是什么意思？二哥褚仲模说：“好吧，当了小闯将，那就到大风大浪中去闯一闯吧！”

小褚家居华蓥山麓，父亲曾是大办钢铁时的“炼铁工人”，因公负伤回到生产队，享受集体照顾，母亲务农，弟兄五人，大哥在外做工，算是亦工亦农之家。二哥仲模中学毕业后，在家随母务农，“四清”运动中，被选调到四清工作队当队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作队撤销，褚仲模被安排在公社当文书。他知道当时红卫兵正在全国大串连，乘车吃住都不要钱，所以他看到小弟仲权当了“小闯将”，也同意让他出去闯一闯。

褚仲权排行第四，生来聪明伶俐，很逗家人喜爱。由于家居山区，常年以玉米、红苕为主，生产队虽有几亩水田，但所收稻谷微乎其微，每年难得吃上两个月的大米。所以当人们逗问小褚长大了干什么时，他会张开小嘴毫不犹豫地说：“到城里去！”

“为什么？”

“那里有大米吃。”

其实城市在那里？是个什么样子？他一点也不知道。

一天，二哥褚仲模给了他10元钱，叫他进城去闯一闯，但不要走远了，早点回来。小褚邀约了几个同学来到合川县城，啊！好大的街、好多的人！他第一次见到了大世面。他们在城里到处乱串，来到一个红卫兵接待站，吃住不要钱，每天吃完饭就往街上跑，大街小巷到处玩……在合川住了几天，听说重庆比合川还要大，坐车也不要钱。于是，又同在合川结识的一些小朋友，乘车闯进了重庆城，继而又闯到了成都。这时，听说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他们又萌发了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的念头，几个人邀约约正准备出发时，广播里传来党中央的通知，号召红卫兵不要到北京，回家乡就地闹革命。小褚一来认为应该听党的话，同时，他出来这么久了，也想家了，于是调头回到了家乡。

小褚回家后不久，“文化大革命”进入白热化时期，造反派由于各自的观点不同，从辩论到争吵，分化成两大派，尔后两派又从棍棒到枪炮，武斗升级，重庆“八一五”与“反到底”两派对打，还动用了大炮、坦克和“军舰”。小褚从未见过打仗，多想去闯闯，二哥褚仲模这回可不同意了。他对小褚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子弹没长眼睛，钻到你身上就要命，绝对不能去乱闯！”因而小褚没去参加武卫队，只在小沔中学的文攻队当队员，负责上街贴大字报、刷大标语。

1967年夏，合川县的造反派也分化成了“红大”和“革大”两大派，县城的“红大”被“革大”赶出，集中来到小沔地区。不久，“革大”兵分三路攻打小沔，时逢北碚“捍红总部”两车武斗人员于4日来到小沔，当“革大”武斗队到来时，遭到“捍红总部”武装迎头痛击……

战火打响时，小褚同几个小闯将正在贴大字报，听到像炸鞭炮的枪声，丢下浆糊桶和未贴完的大字报，一齐跑去看热闹，他们绕道山边以为那里安全，却恰巧闯入了对方的阵地，在相隔不到十几米处，一支127高射机枪枪管正对准着他们。小褚见了赶忙喊：“莫开枪！莫开枪！我们是来耍的！”吓得掉转头就往回跑……幸而他们喊得快，对方见是几个小孩，没扣动枪机。

经过这次冒险，小褚被他二哥“管制”了起来，心里好不是滋味。他看到一个个红卫兵，身穿黄军装，臂戴红臂章，肩上扛着枪，雄赳赳、气昂昂……多想也能和他们一样神气。其实他自己也知道，即使给他一支步枪，他还没有枪高，要是有一支手枪在腰皮带上一别，那才神气，但是，要当“头儿”的才行，他一点都挨不着边。不过他反过来一想，这有什么了不起，这些枪都是抢来的，有啥光彩。他曾亲眼看到过一次抢枪事件。抢枪，抢谁的枪？只有解放军才有枪。

小褚终于明白了，最吃香的还是解放军，难怪广播上天天在喊：“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于是他立志要当一名解放军战士。

◇ 军营小兵

“文化大革命”中在合川县“支左”的部队，1967年冬季征兵，征集了大批青年入伍，

褚仲模也应征当了解放军战士。二哥参军，引发了小褚从军的念头。但国家招兵应征的是青年，其基本条件必须年满17岁，而褚仲权才14岁，起码条件都不够。他对二哥说：“二哥，你就参军啦，现在武斗打得那么凶，我也回不了家，怎么办？我要跟你一道去！”

“你这么点儿大，当啥子兵，暂时回不了家，我找个地方你先住着，等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各人好好读书！”褚仲模说。

“学校又不上课！那晓得要等好久？”褚仲权不服气地答道。

公社欢送褚仲模入伍那天，小褚找到来接兵的孙福海营长说：“二哥就参军去了，我也要去当兵。”

孙营长用手摸着小褚的头说：“你快点长吧，再过三年我来接你。”

“为啥还要再等三年？我现在又回不了家，这三年怎么办？就收下我吧！”

“再过三年你17岁呀，就够参军的条件了，哪有你这么小就当兵的？”

小褚急着说：“怎么没有？小兵张嘎当八路军，还没有我大，他得行我为啥就不能？”

孙营长见小褚急得那样儿，笑着说：“那是什么时代，现在又是什么时代……”

“不管什么时代，张嘎能当我也能当，我就是要参军！”小褚扭着孙营长，要他答应。

孙营长与小褚接触几天来，觉得他年岁虽小，却活泼机灵，逗人喜爱。至于小褚要参军的事，即是他同意，也作不了主。孙营长说：“收不收你？我们部队作不了决定。既然你的决心这么大，何不自己到县武装部找领导去，只要他们同意了，你就当得成兵。”

果真，褚仲权借送二哥褚仲模入伍为名，一路到了合川。第二天一清早，他找到武装部王崇良政委，要求参军，说他家乡武斗打得凶，有家不能归，只有去当兵。王政委当即给他一顿下马威：“什么回不了家？你这么大点当什么兵？出去，出去！”

正在这时，从里屋出来一位高高大大的军官，伸手摸着小褚的头：“来，我问你。”把他引到门外，听了小褚的陈述后说道：“你这娃儿不错，先找个亲戚家住下，快点长大，明年我来接你！”

这位军官就是这次来合川接兵的代理团长，名叫张保林，是军务科科长。张科长是北方人，平时对人态度非常严肃，一般人都怕接进他，这次他对小褚却一反常态，使人感到和蔼可亲，站在一旁的郭参谋听了，过来对小褚说：“你不要慌，我给你想办法。”

郭参谋叫郭修云，原是张科长的通讯员，他最了解张科长的性格，听他刚才对小褚说话的口气，意识到张科长很喜欢小褚。郭参谋通过这两天不时与小褚的接触，见其机灵过人，也产生了好感，于是悄悄对他说：“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就要出发回部队……”

褚仲模已分配到482团5连。小褚送走了二哥，第二天早晨，便来到134师回南充的车队，走到郭参谋所在的车前，自称是南充师院“临联”的学生，要求搭车。“临联”是134师在南充支持的一派造反派，当然一说便准，随车到了南充，郭参谋将其安排在司令部招待所住了下来。

一周的时间过去了，郭参谋对张保林说：“张科长，合川要求参军那小子，现还在招待所住着，你看怎么办？”

“哪个小子？”张科长问。

“就是在合川武装部门前向你要求参军那小子。”

“他怎么来了？”

“我们回来时，他爬上车赖着不走，就把他带回来了。我把他安排在招待所，已住了一周了，你看怎么办？”郭参谋说。

“唉，你把他叫来我看看。”张保林将此事向师长张进作了汇报，请示该如何办，张师长说：“这样聪明勇敢的孩子，你在哪里去找？你就把他安排在你那里嘛。”

褚仲权被叫到张科长跟前，行了个军礼：“报告科长，我，我……我要求参军，一定当一名听话的好解放军！”

张保林看到他天真活泼，机灵果敢，又带有几分憨厚，很是喜欢，便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褚仲权，冯陈褚魏的褚……”

“什么褚仲权，就叫褚闯！你不闯能到我这里来？”

小褚痛快地答道：“要得，我就叫褚闯！”

褚仲权从此就改名为褚闯，在部队里首长和战友们都亲切地称呼他“小闯”。

◇ 走进“三座门”

褚闯被安排在军务科机关，准备培养作打字员。郭参谋领着他到后勤部领来军装，因他个儿太小，领回一套最小的5号军服，但拿来一穿，上装有如道袍，下装裤腰拉上胸膛下面还拖在地上多长一节，大家见了哄堂大笑。张科长说：“不怕，有办法，我拿回家给你改一下就行了。”

当兵还得受训，张科长将他送到师直通讯营通讯连通讯班参加新兵训练。

寒冬腊月的南充，寒风刺骨。可是，新兵操练却热气腾腾。这天，在新兵队列的最后，突然增添了一名小兵，身材比一般新兵要矮一个多头，个子不大，却动作灵活，操练认真，很受教官和战友们的爱戴。

褚闯在训练中特别顽强认真，不仅步兵常规操练全部符合标准，摸、爬、滚、打，动作之精确、快速，也首屈一指，多次被教官调出队列作示范。从没有人听他叫过苦、喊过累。特别出奇的是，在实弹射击时，第一枪他连眼都不敢睁，子弹不知飞向了何方，但就在这一枪之后，却枪枪中靶，有的还命中靶心。教官见其射击优良，破例将手枪给他练习，也从未脱过靶。因而新兵营的官兵都称赞他将来一定会是个神枪手。

新兵训练还未结束，正逢各造反派实行“革命大联合”，师部宣传队要排练一系列宣传大联合的节目，需要有人演学生代表。宣传队的队长原是通讯营的干部，一天回到原部队，恰好碰着褚闯，当即叫来询问，觉得褚闯正是他需要的最佳人选，找到通讯营的领导，将褚闯借调到了师部宣传队。

褚闯在宣传队，根据导演的要求，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这对他来说也是重操旧业，演学生，他本来就是学生，演小闯将，他本来就是小闯将。宣传队准备在给师部首长汇报演出后，就给他正式办理调动手续。

汇报演出这天，各级首长都来观看演出。张保林科长当然也在座。汇报演出开始了，随着剧情的发展，台上出现了一个演学生的小演员，活蹦活跳，特别引人注目。张科长一看：“啊！这不是小闯吗？”

在部队里有的人对宣传队有看法，特别是有些带兵的军官，把宣传队当成染缸，认为再好的战士到了宣传队，就要变得自由散漫起来。所以，张科长见褚闯到了宣传队，非常生气，本

来褚闯入伍以来，因为人小，又无处可走，每到休息日，张科长就把褚闯带到自己家里。小闯到了他家里，脚不停手不住，不是抹屋，就是扫地，丢了这样做那样，很逗人喜欢。张科长有个小儿子叫张建，比褚闯小两岁，他俩经常在一起玩，时儿在一块学习，时儿背起汽枪到郊外打麻雀，形影不离，有如亲生兄弟一般，张科长也无形中把他当成亲生儿子看待。现在居然有人把他弄到宣传队去了……汇报演出完，张科长叫来宣传队长问道：“你们搞什么名堂，褚闯是我送去参加新兵训练，你们擅自将他拉到宣传队去，是谁批准的！？赶快跟我放回来！”

褚闯回到师司令部军务科，在办公室学习打字，同时还抽空干些杂务。所谓杂务，就是有人喊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而他本人又为自己规定了一条，凡是没人干的事，他都主动去干。由于他工作勤奋，见啥做啥，从不偷奸耍滑，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爱戴。不仅如此，在他初学打字时，都以为他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才小学毕业，但不到两个月，他就以速度快，差错少而在全师打字员比赛中名列前茅。

196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军与第十三军换防，五十四军开赴云南，褚闯随134师驻扎保山。不久，五十四军又奉调开赴河南，褚闯所在的134师驻扎焦作。在这些年里，褚闯已成了一名标准的解放军战士，“小神枪手”。并连年被评为五好战士。

这时，张保林已晋升为五十四军军务处处长。原来的五十四军军务处张处长在重庆“支左”时，在山城电影院中弹身亡，处长一职长期空缺，方调张保林继任。

张保林调司令部任军务处长后，准备将褚闯调军务处担任机要员，但尚未到职，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1969年，中央军委总参谋长黄永胜要找一名贴身警卫，总参派动员部部长兰文兆来到五十四军，在全军进行遴选。兰文兆原是134师政委，张保林处长向他推荐了褚闯，经过严格审查，层层筛选，最后选中褚闯和五十四军耿副参谋长的警卫员岑永国二人。本来只选一人，为何选出两个，这是为了怕黄永胜不满意，所以选出两人带回总参再从中择定一人。

褚闯被选送总参的消息传出，战友和领导纷纷前来向他祝贺，军务科还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张保林处长在家设宴给褚闯送行，还专门邀请郭修云作陪。依依惜别，张处长语重心长地对褚闯说：“你这次能选送到中央，前途无量，要好好干，处处要小心谨慎，认真负责。有机会要回来看看，我们如果上京是一定会来看你的……”

褚闯到了总参，先是参加军事训练，这实际上是作进一步的考核。具体科目是常规步兵操典，擒拿格斗，实弹射击，不消说样样都得到了满分。训练结束，于1970年初，又同岑永国一道被送进“三座门”。

“三座门”位于北京五四大街，是与中南海齐名的古建筑，地处北海、景山一线，据说是旧时皇帝休闲娱乐场所，中央军委办公厅设立于此。管理这里的机构是总参服务管理局，褚闯就在管理员田森林手下工作，他的班长叫胡彩印。这是一座北京老式大院，地盘宽，房屋多，有大小的会议厅、娱乐厅、餐饮厅以及大大小小的活动室，数十余间。军委各级首长到此开会、议事和休闲、娱乐者，络绎不绝。服务管理局的工作就是为来此活动的首长们服务，褚闯在此处的工作，就是端茶送水，听从使唤，无所不做。这实际上是在安排他见习，让他先多认识些首长，多了解些首长的生活习惯，从而晓得如何侍候首长。褚闯本来就很机灵、勤奋，对这些工作根本不在话下，不几天就赢得管理局上下的喜爱，来此活动的首长们也注意到这个小伙子，凡是他送水端茶到身边，总要喊住问长问短，攀谈几句。有一天，李德生来了，褚闯给他送去一杯茶，李德生早看中了他，叫他坐下谈谈。李德生对褚闯说：“你是合川人，解放重庆时我还

在北碚住过哩，合川与北碚不远吧，说来我们还算是老乡啊。”

褚闯天真地答道：“首长在那里时，我还没生哩！”

“那当然，你这才好大点儿！小老乡，我那里还差个人，你愿不愿意来？”

“为首长服务，到哪里我都愿意！”褚闯站起身立正敬礼答道。

李德生找到管理局，要调褚闯去他那里工作。管理局的领导回答说：“这是专为黄总长选调来的，没有办法改变！”

虽然李德生要褚闯未成，但他对褚闯仍很好，每次来“三座门”，都要拉到褚闯摆谈摆谈，格外亲切。

褚闯在“三座门”工作了近4个月，于1970年5月中旬正式被黄永胜选中，调到了黄永胜家。岑永国则被分配到叶剑英家管理家务。

◇ 小鬼想上天安门

黄永胜的家有两处，一处在北京城内，这里只住有厨师、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是专门接待前来看望他的老部下或亲朋好友的，黄永胜一般不会客，均由夫人项辉芳出面，叙谈叙谈，招待一餐饭。他和夫人住在北京西山，这里地势险要，风光秀丽，景色宜人，房屋豪华宽敞，设有办公厅。家里除警卫连外，服务人员有50多人，医生、护士、厨师、花工应有尽有，在这些人员中专门建有党支部。支部书记吕正辉，原是东海舰队的师职军官。

黄永胜夫人项辉芳是长征干部，黄兼任军政大学校长，项是军政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黄从未到过学校，实际是项辉芳负责。他们有四个儿子：长子向阳，在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当参谋，同林立果一起工作，其妻刘小萍，是广州军区司令员刘兴元的女儿；二儿向林，在北京部队某部当连长；老三向辉，在广州部队工作，是搞文艺的，另外还有一个么儿。

黄永胜的贴身警卫名叫费世金，是从广州军区带来的，一个精强力壮、骁勇善战的铁汉。褚闯来到黄家，作为费世金的接班人，首先就是向他学习军事本领和警卫知识，由他带领进行一些特技训练。诸如手枪射击、战地救护、安全防卫等等。其实，这些科目对于褚闯来说，并不陌生，多少他都练过，只是门门通而不精。这次训练比起在部队训练时，更苛求、更严格了，成天起早贪黑地练，一个动作、一个科目，稍有不准之处，就要重来，有时一天要练数十次，直至准确勿误。一练就是数十天。特别是手枪实弹射击，首先熟悉各种手枪的性能和特点，然后练习拆卸和装配，射击时先练死靶，再练活靶，先练30米靶子，再练50米靶子，先要求枪枪不脱靶，再要求枪枪中靶心，直至练到指哪打哪，成为“神枪手”为止。

一个多月的训练结束后，褚闯才随费世金见习黄永胜的警卫。首先熟悉首长的生活习惯，了解家中成员情况。所谓见习只不过是向费世金学习，还贴不到首长的身，只能跟着费世金的屁股转。

褚闯在黄永胜家所有工作人员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工作勤奋踏实，很逗人喜爱，人们都亲切地称他小闯，有时也叫他“小鬼”。

1970年国庆节，黄永胜要上天安门参加国庆典礼，当然贴身警卫要跟随一道，而褚闯就没份。费世金将这个情况告诉他后，他闷不作声，过了好一阵子才说：“我如果也能跟着去天

安门该多好哇！”

费世金很理解褚闯的心情，想了一会儿说：“这要首长同意才行，好！我向首长反映。”

费世金将褚闯想上天安门的事向黄永胜汇报了。黄永胜平常对人非常严肃，特别是对高级将领，说一不二，难见笑容。但对下属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他听说褚闯想上天安门，很爽快地答道：“可以嘛，你带着他就是。”

国庆节这天上午，褚闯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梦想，随黄永胜登上了天安门，在天安门城楼亲眼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心情非常激动，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刻。回来后，他兴奋不已，连夜写了入党申请书，亲手递给党支部书记吕正辉说：“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之后，褚闯便被安排直接为黄永胜服务了，他跟随在黄永胜身边，正式接替了费世金的工作，成了黄总长名符其实的贴身警卫。费世金当时同京西宾馆一名服务员谈恋爱，后来通过黄永胜将其调来黄家作服务员，两人结了婚。这里有一个规定，凡是结了婚的人就不能再作贴身警卫，项辉芳动员费世金去军校深造，费不愿意，后调南京军区保卫部任副部长。

所谓贴身警卫，顾名思义，就是跟随在首长身边，形影不离地保护首长。在家里有警卫连，进门有一间警卫室，贴身警卫就住在这里。里面是一间休息室，也是办公室，内有写字台、电视机，由于黄永胜喜欢听古典音乐，还有一台古色古香的古老唱机，形状像洗衣机，后来又购买了一部日本进口的磁带录放机。再里面一边是洗手间，一边是首长卧室。黄永胜的生活习惯，多在夜间工作，一般要到下半夜才睡觉，褚闯作为贴身警卫，要在首长睡觉后才能入睡。黄永胜一般在上午10时左右才起床，但褚闯必须在这之前就要起来，将首长的衣物及其盥洗用具准备好，待首长按响床头电铃，就得赶快将浴盆中的水放满，水温调好。黄永胜这才披着睡衣走进浴室沐浴，然后洗脸刷牙。这时在休息室泡好茶，秘书送来要办理的文件，并将这一天首长活动安排表，交给贴身警卫。当首长批阅完文件，褚闯就按表上的安排，送出去接回来。由于所到之处都是警卫森严，贴身警卫只管接送途中的护卫。外出时黄永胜乘坐一辆红旗轿车，这种车是部长级以上首长坐的，车身较长，内分三排，前排是司机和警卫室，褚闯就坐在前排警卫室，黄永胜坐中排，后排坐生活秘书和医生或护士。

两个多月过去了。一天，党支部书记吕正辉找褚闯谈话：“你的申请支委会研究了，大家对你都很了解，你工作勤奋能干，进步很快，基本上达到了党员条件，但是党章规定入党年龄最低要年满18岁，你现在年龄还不到，希望你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锻炼，我相信年龄一到就会达到你的理想。”

就在这次谈话不久，褚闯被下放锻炼，到连队当战士。

1971年1月，褚闯离开黄永胜家，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第三师。这是一个机械化部队加强师，装备优良。褚闯到达第三师后，下放到驻怀柔水库的第七团第九连一排一班。九连是专门执行特殊任务的尖刀连，连长倪金虎是全师著名的一员虎将。一班是尖刀班，班长张明，不仅是全师标兵，而且是人民解放军全军的战士代表，曾以此身份出席过人民大会堂的国宴。褚闯当兵三年，一直在机关工作，这才真正算是在战斗部队中当上了一名战士。尖刀班训练要求之严格、艰辛，与其在机关的训练，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所练的科目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几乎样样都操练过，差不多都得过优秀。但在这尖刀连的尖刀班里，几乎样样都不够标准。成天起早贪黑地练呀，练呀！整得他筋疲力尽，白天练了，有时晚上还得练。一天累到黑，夜里睡得最香的时候，忽然警铃响了，警铃就是军令，听了就得翻身起床，紧急集合，

进行夜间演练。这种夜间操练虽然不是天天都有，但是哪天有哪天没有，事先并不告诉你，所以战士们天天睡觉思想都很紧张，生怕睡着了没听到警铃误事。

提起警铃，第七团的警铃是别具一格。它分一级警铃、二级警铃至五级警铃多种，有各种不同的规定，战士听到后就要按规定行事。特别是在这五级警铃之外，还有一种特级警铃，即“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铃声不断。战士听到就要拿起武器，任何东西都不准携带，5分钟内到指定地点集合，一律不得迟到。

褚闯到第七团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开展冬季大拉练活动，第三师从北京出发，经东北辽宁、吉林辗转至秦皇岛再返回北京驻地，在冰天雪地里顶风冒雪急行军，逢山登山，遇水涉水，徒步行程千余里，回到北京已经是春暖花开时节。稍许休整，又投入了夏练，这叫做夏练三伏，成天冒着炎炎烈日，在演兵场上摸、爬、滚、打，脸晒黑了，身上脱了一层皮……如此这般，褚闯可算磨练成了一名真正的尖刀班战士，受到尖刀连的表彰，连指导员找他谈话，说他军事上过得硬，思想进步，团结同志，处处都能起带头作用，基本上达到了共产党员的标准，党支部讨论过他的情况，准备在他回机关前在连队吸收他入党……

◇ “九一三”中一个小波澜

1971年9月13日清晨，战士们刚起床，突然“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警铃响个不停。

“这是特急警铃，有紧急任务！”尖刀班班长张明喊道：“同志们！赶快拿起武器集合！”

第九连刚集合完毕，刘副团长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提着枪，气喘吁吁跑来，还隔老远就喊：“今天有紧急任务，命令第九连为先头部队，赶快上车出发！”

连长倪金虎接受命令：“是！”战士们龙腾虎跃，早已翻身上车。

汽车驶出军营，飞驰在宽敞的柏油马路上，战士们摸不清出了什么事情，心情非常紧张，一个个端起枪，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

十数辆军车，疾驶了约一小时，来到沙峪地域，见一片玉米地里，围满了人群。原来这些人是当地民兵，他们已经把一架被空军战斗机迫降下来的直升飞机包围起来。听说这架直升飞机企图叛逃，机上下来的三人已有两人自杀，一人被俘。部队迅速封锁了现场……

这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驱车来到。他查看了现场后，直接向周总理通话汇报。周总理指示：飞机上的文件和死者、当事人，最快运到北京；保护好现场。

吴忠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命令第九连连长倪金虎派人将飞机上所有文件、资料迅速转移下来。

连长命令褚闯登上直升飞机把东西往下传。

褚闯就这样亲历了“九一三”事件中的一幕。

9月14日上午，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一辆吉普车开到九连驻地找到褚闯，把他送到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军事管制区软禁起来。

褚闯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也没有人来管他问他。

9月15日上午一辆货车送来蔬菜，11时许回北京城时，褚闯便爬上车走了。车到北京市郊时，他跳下车来，找到一家公用电话，直拨黄永胜家：“喂，你是黄总长家吗？”

“是呀，你是谁？”

“我是褚闯。”

“褚闯！你在什么位置，赶快告诉我！”

褚闯听到电话里声音很凶，马上搁了电话。接着他又拨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的电话，找管理员田森林。

田森林接到褚闯的电话，叫他马上到他那里去，他在三座门前接他。
褚闯当即乘车到三座门，田森林果然在门前等着。

田森林把褚闯迎进办公室，端上茶，闲谈了几句问明褚闯近来的情况后说：“小闯，你还年轻，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站稳立场啊！有很多事情要多用脑筋想想，你看，王府井那张油画画得多好，上面画的苹果、梨子水淋淋的，使人看了就想吃，可那是假的……”

褚闯明白这是在暗示他。

田森林接着说：“小闯，你要听我的，马上回去，我让卫戍司令部派人来接你……”

再说褚闯跑出后，直到吃午饭时才被发觉。开饭时，管理人员到处找褚闯吃饭，却不见他的人影，当时担任卫兵的战士才说，新来那位战士，在11时就搭乘货车出去了。这才向炮团团部、三师师部汇报，说卫戍司令部送来那个战士褚闯逃跑了，师部又向卫戍司令部汇报。吴忠司令员听了非常焦急，说：“这个人很重要，他知道的事很多，一旦走漏了消息，那还了得，绝不能让他跑掉，你们马上派人追寻，堵住交通要道各车站路口，一定要找到抓回来！”

一个小小的褚闯出走，为何会引起吴忠如此不安？原来有关“九一三”事件尚未对外公布，如果将此消息泄露出去，其后果不堪设想，褚闯是黄永胜的贴身警卫，又是从沙峪现场归来，知情甚多……于是，吴忠命令卫戍区第一、第二师，立即派人控制北京的交通要道和车站码头，拦截褚闯。同时又命令司令部派专人控制苏联大使馆周围，防止褚闯跑到苏联大使馆去。一时间北京卫戍区如临大敌……

这时，军委办公厅管理员田森林向卫戍司令部通了电话，不到10分钟，卫戍司令部派来两名军官，将褚闯接走。

◇ 专案组作出结论

褚闯又被带到了那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他被交给第三营营长张仲春直接监管。

张营长找褚闯谈话，追问道：“你为什么要逃跑？你想过没有，难道会轻而易举地让你跑掉吗？”

褚闯说：“我并不是想逃，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明不白地把我送到这儿来？我想去弄清楚……”

我如果要逃跑，会跑到军委办公厅去吗？”褚闯把头一甩：“我又没作坏事，为何要逃！？”

张营长看到褚闯这神态，就联想到他那个当兵的儿子，也是这样天真、这样犟。便心平气和地说道：“不管怎么说，你私自跑出去就不对。你还年轻，在大是大非面前，绝对不可乱来。好吧，你先到食堂把饭吃了好好休息，明天再说。”

从此，褚闯就在这里接受审查。张营长对他说：“现在你的任务就是接受审查，要很好地配合专案组，首先是自己坦白交待，要老老实实，竹筒倒豆子一齐倒干净。然后就是检举揭发，把黄永胜家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全部揭发出来……”

褚闯说：“我扪心自问，从没作过坏事，要我坦白什么？”

张营长说：“管它是坏事还是好事，你把你在黄永胜家的情况，全部如实地写出来就行了。”

褚闯终日伏案写交待，他从如何参军、如何被选送到黄永胜家，以及后来下放第三师、直到“九一三”登上直升飞机等等，全部原原本本写了出来。接着又写检举揭发。他不懂该检举什么，又该揭发什么？还是按照张营长的说法，有什么就写什么，晓得什么就写什么。成天坐着写呀写呀！他把黄永胜家的人员情况以及与黄永胜经常交往的人员，黄永胜的活动情况，所见所闻，尽其所知全盘写了出来。历时3个多月，除了张营长同他摆谈、询问外，专案组成员只有一人找他谈过一次话，时间不到两小时。

交待光了，检举完了，成天无所事事，褚闯便自动地在营部当起勤务兵来，哪里有事情干他就往哪里去，一些没有人干的事，他也主动去干，成了营部里里外外一把好手。人们都称赞他是不怕苦、不怕累、勤奋好学的好战士。

炮团三营办有一个农场，不久，褚闯被安排在农场劳动。这时正是插秧季节，在农场参加农业生产的都是炮团战士，没有一个人会插秧，插不稳、栽不直，甚至有的刚插下，一松手秧苗就浮上了水面。农场场长是一位副指导员，他动员战士中有会插秧的出来作示范。

这下褚闯又有用武之地了。他从小在家就学会了插秧，而且插得又快又好，人们都称赞他是小插秧手。指导员一喊，他便站出来说：“报告，我来试试！”

褚闯下到田里，左手操起一把秧苗，右手随分随插，一排五行，插一排退一步，只听得“嗒、嗒、嗒……”水响，插得又快又准，横看竖看都是四方茺，窝距行距整整齐齐，秧行排列笔直，比牵绳而插还伸展。大家看着都惊呆了，看不出这位小战士还是个插秧能手。

褚闯在农场劳动了3个月后，又回到炮团三营营部。

对于褚闯的问题，经过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专案组内查外调，最后作出结论，认定褚闯本人所写材料与调查的情况相符，因他还年轻，在黄永胜身边时间不长，没有参与其阴谋活动，所作所为均属正常工作，结论是褚闯没有问题，作复员处理。

褚闯乍一听这个结论，心里非常高兴，口头没说：“是嘛，我有什么问题！”但他转念一想：“复员！既然没有问题，为何要在这个时候复员？这不是明摆着……”

◇ 为了前途提个要求

一天，炮团团长和政委来到三营，动员褚闯复员，问褚闯有没有意见。

褚闯说：“感谢组织对我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复员我也没有意见，但在这时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复员，我接受不了。”

团长问：“为什么，你说说看！”

“林彪事件轰动全国，我作过林彪死党黄永胜的贴身警卫，就这样复员了，今后还有谁会相信我？岂不是要背一辈子的黑锅，从此断送了我的一生？我这一生还很长，我还要为党、为人民、为革命作一番事业，这是我的最高理想，就这样复员，不就断送了……”

团长说：“不是跟你作了结论，一看就知道没问题。”

“结论很好，但在纸上，装在档案里，有谁看得到，有谁愿意去看？”

“那你说该怎么办，你的要求是什么？”政委问道。

“我要求入党后再复员，在没入党以前我绝不能离开部队。我参军5年来，最后遇到这个林彪死党，这不是我所愿得的，组织上给我作了结论，在这个事件中我没有问题，所作所为都属于正常工作，既然如此，我在各个部队中的表现有目共睹，所以，我要求入党后再复员，这不是苛求，也不是无理取闹，要不是林彪事件，我去年满18岁，在九连下放锻炼时就入党了。”

团长、政委都无法答复，表示向上级请示后再说。

当时在部队入党，是由连队党支部通过，营党委批准，报团党委备案。关于褚闯要求入党的事，炮团党委请示北京卫戍区司令部，答复入党要按党章办。这是一个特殊问题，团党委拿不准，怕搞错了要承担责任，于是就搁置了下来。

张仲春营长对褚闯一向有好感，他认为褚闯被送到三营后，一直表现不错，褚闯提出入党要求，既符合党员条件，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他在复员前解决不了入党问题，他这一生的前途将不可想象。张营长以褚闯的事，联想到自己的儿子，他想：要是自己的儿子落到褚闯这种状况，我会怎么办呢？他越想越同情褚闯，于是，他去找了团政委。

张仲春对政委说：“褚闯提出入党，时间很早，第一次是因为年龄不到18岁，第二次刚满18岁，七团九连准备吸收他入党时，就碰上林彪事件，这次他又提出申请入党，是够条件的。组织已给他结论，政治历史清楚，在林彪事件中立场鲜明，思想进步，上进心强，一贯表现很好，这样好的青年，现在我们扶他一把，将来一定会成材。我们不妨根据党章规定的原则，对褚闯申请入党的事，在支部进行一次讨论，够条件，通得过，就吸收入党。”

政委沉思片刻，表示同意：“好吧，就按你的意见办！”

1972年11月27日，在纪念毛泽东《这样训练好》指示两周年之际，褚闯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 【研究报告】

### 文革漩涡中的38军

• 余汝信 •

对38军的历史，尤其这支部队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多有误传，实有予以澄清之必要。

38军，文革期间的番号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八军”。其前身，是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1纵与2纵、6纵，合称林彪“三虎”，同为公认的东野主力。追溯至更久远的历史，其112师334团的前身，为1928年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暴动后创建的红5军之一部，113师338团的前身，为1932年吴焕先等重建的红25军75师一部。1937年8月，两部分别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的两个营。112师335团和113师337团，前身亦为以红军干部为骨干组成的115师一个营和一个补充团。该军114师，前身则为东北军111师，1942年起义投奔中共，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

“三虎”之中，1纵、2纵与林彪的渊源远不及6纵。6纵16师，即后来的43军127师，其历史可溯源至北伐战争中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即中共早年掌握的第一支正规部队——“叶挺独立团”）。1926年，林彪从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分配在该团当见习排长，从此与革命军事生涯结缘。

弄清历史渊源，是重要的。不要老说38军与林彪本人如何如何。如果非要说什么林彪嫡系，真正算得上的，只有一个127师。说38军是林彪嫡系，怎么不说它是彭德怀赖以起家的老底子？1纵在东北战场确实打得好，原因一是其基础好，二是林彪指挥得当，与其是否嫡系，并无必然联系。

1953年7—8月，38军返国，集结于吉林省境内长白山地西南端。军领率机关驻通化市内，所辖112师师部，位通化市郊庙沟；113师师部，位山城镇；114师师部，位海龙。1967年2月15日，军委电令：“奉毛主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对陆军第21、69、38军的部署，作出调整：

21军，由山西移驻西安、宝鸡地区，由北京军区调归兰州军区建制。驻甘肃平凉地区之陆军第62师，归还21军建制。

69军，由河北保定地区移驻山西，接替21军防务。

38军，由吉林通化地区移驻河北保定地区，接替69军防务，由沈阳军区调归北京军区建制。

军委又令：“以上部队接到命令后，应迅速做好行动准备，尽快开动。21军、69军务于3月5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38军务于3月8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

三个军的连环调动，牵动大，时间紧。据38军军史称，2月15日凌晨4时许，受领移防预先号令。当日，军部分主要领导即乘飞机先期到达。16日0时15分，受领沈阳军区转“部署调整”电令，18日19时12分，先头部队第334团1营乘火车离开通化，从下达预先号令到第一列列车发出，中间仅有三天时间。

所以，据该军军史，可以确切得知，38军调防保定的时间，是1967年2月，而不是在“文革前夕”，时距毛泽东解决北京市委“独立王国”，已近十个月。

38军移驻保定地区后，代号改为4800部队。时军长李光军，年48岁，政委王猛，年47岁，皆为38军的新人。

李光军，江苏睢宁人，新四军——三野出身。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2纵6师17团团团长，后任由6师整编的21军63师师长，1956—59年曾赴苏联总参高等军事学院学习

四年，回国后历任39军副军长、64军军长，1964年由大校晋少将，同年接替邓岳，任38军军长。

王猛，河北盐山人，八路军一一二野出身，在二野16军46师历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1954年调任长春第二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1961年任校政委，正军级。同年二政校撤销，向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要求回野战部队，未有正军职务可以安排，降任38军副政委，在所不计。1964年与李光军同时晋升少将，1966年12月，接替于敬山任军政委。

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批“华北山头主义”，郑维山说，38军调防保定，是杨成武提议，得毛泽东批准。杨成武此议用心何在？是否有向林彪示好之意？笔者不好妄自揣测。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杨成武此举，却应了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38军的到来，成为杨所支持的北京军区的一大麻烦。

关于保定的军事地位，明末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有云：“重山西峙，群川东汇。宣府、大同为之屏障，倒马、紫荆为之阻隘。联络表里，翊卫京师，诚重地也。在昔河朔有难，保定恒先受之”。

上世纪50年代初，河北省会、省军区、69军军部同驻保定。1958年，省会、省军区搬至天津。1966年4月间，中央酝酿天津为直辖市，河北省会、省军区再由天津回迁保定。

1967年1月，河北省军区和69军介入保定地区文革。2月11日，宣布有三万余人的“河北省工农兵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一造反总司令部”（“八一总部”）为反动组织，出动27个连队，以武力强行取缔了“八一总部”等多个群众性组织，逮捕1200余人，入狱238人。

38军初抵新防区，于2月24日奉命与省军区一起担负保定地区的支左任务，成立支地办公室。军党委分工，第一书记、军长李光军管“三支两军”，常委、副军长刘海清、副政委邢泽辅之，并主管保定市支左，挡在第一线。第二书记、军政委王猛管军内，对外不出面。

介入保定地区支左之初，38军尚无一定之见。自1967年4月以后，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导火线，保定造反派组织重新洗牌，组合成“工总派”（即“农大造反团派”）和“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两大派系，较稳健、保守的“工筹派”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省军区排斥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主动对新来乍到的38军示好，寻求支持，38军与河北原当权势力无任何牵连，在感情上亦倾向于“工总派”，与“工总派”一拍即合。

38军与省军区（当时称保定“两军”）在支持谁的问题上各持己见，渐行渐远，裂痕加深，终致水火不相容。与省军区荣辱与共的北京军区，对38军颇有微词。保定两派也各恃有军队方面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于1967年6月22—23日发生在保定市内的河北农业大学，两派近万人大规模混战，虽得38军和省军区赶至现场试图平息，但未能奏效，造成7人死亡，近300人受伤（其中部队数十人）。

为解决保定问题，八月，中央通知保定两派代表进京汇报。期间，两派代表与“两军”——河北省军区马辉（司令员）、曾美（政委），38军李光军、刘海清签订了双方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武斗稍歇，但两派矛盾未能根本消弭。

1967年12月至翌年1月间，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视察，为省革委会的成立清除障碍。时驻河北各军、省军区均倾向于各地较保守一派，唯独38军支持激进派，陈等急于稳定局势，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未免站在北京军区立场，对38军支持的一派作了严厉批评。如郑维山1968年1月6日在邯郸炮14师驻地接见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军负责人时就说：“农造团头头崔士林，他父亲崔田民（余注：军委铁道兵第二政委），崔田民利用501狂派（余注：指石家庄铁道兵学院“铁道兵团”），伸向石家庄，是河北的反军罪魁祸首。崔士林利用造反团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是插到保定和各县破坏大联合的，各县大联合都被破坏了，五月份以来对付群众，对付河北省军区和北京军区……”。

“农大造反团”为“工总派”核心，是得到38军支持的，陈等讲话虽然都没有明点38军的名，但无形中给38军造成了压力。

惟北京军区各人知道，38军是毛泽东本人批准调至保定。毛泽东、林彪对38军的态度如何，郑、李等人揣摸不透，不好太造次。与其和38军硬顶着干，不如退一步以避其锋芒。

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联名签发致毛泽东及中央的《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建议在省革委会成立同时，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其理由是“石家庄的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的前头，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可以形成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即发文批准郑、李的报告。

到了1971年1月华北会议期间，李雪峰在“我的检查”中检讨了此事经过：“在河北省革委会成立前后，陈伯达直接出面在筹备会上讲话，进一步打击三十八军，压迫另一派群众组织。他策划了省会搬家，先由他出主意，我和郑维山同志同意，两人联名写了报告，用他编造的搬家理由，欺骗了中央”。

不及两载，河北省会三易其坡，也真够折腾的了。事后有人说，这是郑、李故意让38军难堪，此说似乎不无道理。石家庄是63军军部所在地，河北省革委会组成人员中，63军军长张英辉、省军区马辉、曾美同为副主任，而其他各驻军首长，包括38军军长李光军，则只是常委，这安排本身，就很难说没有亲疏之分。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杨成武是郑维山的老上级，现突被撤职，无疑打了郑一记闷棍。郑自顾不暇，稍舒缓了38军的压力。3—8月，中央在北京举办保定两派代表、两军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保定班，学习班长达五个月，在中央的督促下，由改组后的军委办事组出面做两军工作，两军、两派都各作了一些让步，通过协商，8月中，成立了保定地、市革委会，地区革委会主任，由38军副军长刘海清担任。

10月，李光军突接调令，平调至武汉军区任副参谋长。李的调动过于匆促，显得有点不大正常。据张云生说，调离李光军是杨成武当军委办事组负责人时提议的，杨并提议由63军副军长徐信递补空缺。报至林彪处，林不同意徐信到38军，有意在本军提拔刘海清升任军长，压下了此事，并由此对杨成武产生戒心。李光军的正式调动，已是在杨成武被撤职大半年之后，内情究竟是否如张云生所言，今天已难以考证。但北京军区不喜欢李光军，应是事实，是刘海清而不是徐信接替李光军任军长，亦是事实。

11月，省军区机关最终随省会搬迁由保定移驻石家庄，38军压力再大减。

1969年，是38军翻身的一年。

2月间，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召王猛到京，当着郑维山的面宣布：保定问题，由38军负全责，北京军区不要介入，河北省革委会不要介入，河北省军区更不要介入。今后，保定问题直接报告谢富治。谢没有说明，这是那一方面的决定，但王猛可以感觉到，不可能仅是北京军区层次的，应该是中央的决定。

这一决定由谢富治来传达，颇为微妙。其时，北京军区政委共三位：李雪峰、谢富治、刘格平。李为兼任，刘常驻山西，实权已向谢转移。同年12月，中央对北京军区党委作了调整，谢富治、李雪峰、郑维山、陈先瑞四人为军区党委书记，谢排名于首。谢对38军较为放手、支持，处事似比郑、李公道，事情在向对38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保定成了38军一家天下后，王猛对两派都采取了严厉的高压政策。7月，38军和保定地区革委会联合发出“七二二”布告，提出了两派制止武斗、上交武器，无条件回厂、回校，按系统、行业、班组搞大联合，坚决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强制性措施，8月10日，地区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在保定市体育场召开“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宣判大会”，十万多人参加，38军、北京军区和保定地、市革委会的负责人到会讲话，会上宣判，对抗“三个布告”的两名“行凶杀人犯”死刑。高压态势之下，8月底，保定地市实现了“三结合”，到10月，收缴武器工作基本结束，武斗工事全部拆除，武斗人员全部返回原单位，武斗停歇。

军事工作方面，38军此时也受到军委的格外青睐。1969年2月24日，军委电示称，经毛泽东批准，决定将38军组编为摩托化军。编成：军辖三个摩托化师和军直炮兵团、火箭炮团、高炮团各一个。师辖三个摩托化团和坦克团、炮兵团、高炮团各一个。翌年10月，全部完成组编任务，38军成为全军首个摩托化军。

1969年10—12月，63军从河北移驻山西，军领率机关从石家庄移驻太原。原被北京军区视为“刺头”、“骄傲自满”的38军没有被撵出河北，反而，“华北山头”的“老大”63军离开了河北，这真有点儿讽刺意味。翌年3月，38军党委第一书记、政委王猛增补为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38军负责人首次进入河北省核心领导层，这在前两年也是不可能的事。

1970年8月，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翻车，李雪峰、郑维山均受牵连。12月10日，38军党委报告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38军党委的报告，意在借批陈一吐自调防华北后所受的乌气，今天看来，报告一如当时的众多揭发批判材料，不乏牵强附会、言过其实之词。惟毛泽东正愁没有攻陈的炮弹，38军报告正中下怀，即于12月16日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口头常言“实事求是”，这个批示，就十分不“实事求是”。其一，陈伯达以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去河北各地协助解决两派纷争，并非越权。平息地方两派纷争，不是北京军区的“军政问题”，北京军区也绝无可能去阻止一位政治局常委的所为，何况，陈的所为符合当时“大方向”。其二，毛泽东一句“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

了”，将原与此事无关的林彪扯了进来。林彪是否真的对毛说过这样的话，大有疑问。对38军，对北京军区各军的矛盾，林彪其实十分注意避嫌，从不表态。根据目前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自38军调至保定，林彪从未到过该军，从未召见过该军的任何干部，该军的负责人，亦从未单独求见过林彪。这也是“9.13事件”后38军各负责人能安然摆脱干系的重要原因（至于《571工程纪要》将38军列入“借用力量”，仅是林立果一厢情愿，与38军本身无关）。

无论如何，38军的批陈报告，使毛泽东找到了一块“石头”，砸向了陈伯达、郑维山、李雪峰。毛批示当月，王猛获提升为北京军区副政委。次年7月，经毛、林同意，中央调王猛任国务院国家体委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王在任期间，对江青等插手体委渐生反感，有所抵制，江也不悦王，欲借“四届人大”之机提拔庄则栋取代之，王乐得离开体委，“四届人大”前夕，调回部队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粉碎“四人帮”后，应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要求，于1977年2月，重返国家体委任主任（军内职务保留），1981年7月，再回部队，升任广州军区政委，1985年以大军区正职待遇离休。

文革奉行体育外交，王猛对外以国家体委主任身份几乎天天露面，闻名于世。知情者言，以王猛的才干，80年代本可更上一个台阶。惟以笔者愚见，王虽不满陈伯达、顶过江青，在国家体委亦做了不少好事，却也支持过保定地区造反派。就因为这后一条（这本是文革客观环境所致），在主军的邓小平心目中就大打折扣。王猛能以大军区正职“安全降落”，相对于他的同侪，已属万幸。这些，已是后话。

197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根据《通知》所附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军队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陆续撤销“三支两军”机构，撤回人员。前于1971年接替刘海清任保定地区革委会主任的38军副政委徐炜，亦于中央《通知》发出后的翌年3月调回部队。在军队主政的高峰时期，38军除22个团分管保定地区23个市、县的“三支两军”外，还抽调干部战士到京中央国家机关、大专院校“军管”、“军训”，如当时的军参谋长朱月华，就曾奉命到京任国务院对外文委军管小组组长。

1974年，全国“批林批孔”。江青要抓“批林批孔”、批所谓林彪军事路线的典型，抓到了38军。江青派工作组到38军113师338团8连进行“批林批孔”试点，给8连送“批林批孔”材料，形势所迫，38军也不得不派人到8连“总结经验”，这些“经验”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多次发表，8连闻名全国。当年7月28日，王洪文、江青请北京军区三位负责人和38军的四位领导到北京北海仿膳堂吃饭，第二天，王洪文、江青、陈锡联、纪登奎等到38军呆了一个晚上，召开河北省及驻保军、地主要领导及338团8连全连参加的见面会，王、江讲话、赠书，江青又作“顺口溜”夸38军，折腾了好一阵子。但以后的事实证明，江青等所为，徒劳无功。表面虚与委蛇，是没有办法的事，关键时刻，军队不可能与他们走到一块。

1974—76年，“批林批孔”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保定地区武斗、混乱再起，河北省委、省军区难以遏制，中央不得不再次动用早已脱离地方“三支两军”的38军。1976年11月15日，以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秦基伟为组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38军政委王丕礼为副组长，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岱、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38军副军长李连秀为成员的“中央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进驻保定。38军奉命于11月16日对全区各武斗据点实行武装包围，之后，收缴枪支、拆除工事、解散武斗班子，12月13日，保定集中500余人赴京参加由解决保定问题领导小组举办的“学习班”，同时，由省委、38军组建的联合工作组进驻保定，配合地、市委工作，形势迅速好转，保定此一文革的“重灾区”，方根本结束了十年的反复动荡。（2004年2月）



附：文革期间38军正军职领导人更迭名录

军长：李光军（1966。5—1968。10）

刘海清（1968。10—1972。5）

朱月华（1972。5—1976。10）

政委：于敬山（1966。5—1966。12）

王 猛（1966。12—1970。12）

邢 泽（1970。12—1972。12）

王丕礼（1973。11—1976。10）

主要参考书目：

1、陆军第38集团军军史（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

2、纪念李光军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1998）

3、保定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4、陈先瑞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9）

~~~~~

【人物追踪】

《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的沉浮

• 冯骥良 •

第一次捧读《欧阳海之歌》时，我才10岁。回忆读这部长篇小说的情景时，我还隐隐约约地记得，我的确被小说感动了好一阵子。记得我当年写下的一篇《欧阳海之歌》的读后感，还得到了三年级语文老师的一致好评呢。

一晃40年过去了，作家金敬迈又推出了一部新作《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这部带有纪实性的作品，记述了他被送进秦城监狱后的囚禁生活。

一部《欧阳海之歌》，把作家推上了全国文艺界的领导岗位，又一下子把他抛向谷底。全国文艺界领导顷刻间变成了阶下囚。在作家的身上，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作家金敬迈就坐在我的对面，平静地讲述着他的故事。那平和的心态和平静的语调，好像是他正在讲述别人的经历。

◇ 30万字小说仅写了28天，为省17元妻子熬了十几个通宵

作为一个话剧演员，金敬迈需要经常下基层体验生活。在下去体验生活的过程中，他听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叫欧阳海的普通战士，因为和指导员闹矛盾，越级给军区一位领导写了信，信中详尽讲述了他和指导员闹矛盾的由来和发展，后来这位战士竟被火车轧死了。这个故事在金敬迈的内心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怀着极大的好奇心，以及对这个敢于抗上的普通战士的尊敬，金敬迈深入到欧阳海所在的部队采访。短短五六天的采访之后，金敬迈的内心充满了创作的冲动。他以每天一万多字的高速度，夜以继日地笔耕着。仅仅用了28天，一部30万字的长篇

小说脱稿了。作品是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一位领导审查的。这审查的方式也颇为独特，作为话剧演员的金敬迈声情并茂地朗读着，那位首长静静地听着，其结果是朗读的人和倾听的人都泪水涟涟。当金敬迈读完小说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自然段，那位文艺出版社负责人当即表示，小说可以立即交付印刷。

这时一位大首长发话了，让金敬迈把欧阳海与指导员闹矛盾的相关情节改动或删除，理由很简单，指导员是党的代表，是基层政治思想工作的化身。那位首长的口气很硬性，如果不改动或不删去，小说不能出版。这部分内容是最触动作者心灵的，金敬迈舍不得改，可不改书出不了，他只好硬着头皮动笔修改。

又要对原稿进行修改，又要请上级领导审查，可作者手里只有一份手稿，怎么办？只好请人重抄一遍。于是他找了几位高中生，商定每万字付酬2元的价格。可抄这30万字也得60元呀！这60元钱从哪里来呢？金敬迈犯愁了。还是妻子从箱子底翻出了岳母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一对金戒指。妻子把这对戒指送到了玉器商店，只卖了43元，其余17元还是没法解决，妻子只好下班后自己动手，熬了十几个通宵，重抄了小说的部分章节，为家里省下了那宝贵的17元。

◇ 小说印了两三千万册仅得稿费2240元，上缴党费1700元只添了一台新收音机

小说《欧阳海之歌》是先在上海的一家大型文学期刊《收获》上发表的，那是1965年7月，同年10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小说。小说一出版，北京王府井大街新华书店就排起了长队。为一本新出版的小说排长队，在国内的出版史上还极为少见。

小说出版后，全国许多报刊都纷纷连载，第一版就印了15万册。老一辈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地说：“这么好的作品，印1500万册也不多。”

这本小说究竟印了多少，连作者本人也不知道。总政文化部谢镗忠部长说查查《欧阳海之歌》究竟印了多少？可不能超过《毛泽东选集》呀！否则就要犯大错误了。检查的结果让他放心了，小说共印了两千万册，具体数字当时就无法查清了。小说印得如此之多，卖得如此之火，当然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在改革开放，文艺全面繁荣的今天，一本颇为叫座的小说，出10万册已经不得了了。

小说印得如此之多，发行范围如此之广，作家本人究竟得了多少稿费呢？当作家平静地说出了这个数字2240元，连后来的200元修改费也包括在其中了，着实令我吃了一惊。就是这点点稿费，还被作者将其中的近四分之三交了党费。作家给我算了这样一笔账，先是还了300多元的旧债，买了一台收音机，余下的1700元钱全部交了党费。几年之后，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逮捕他时，还下令冻结他的银行存款，其实他们全家惟一的存折上还有600多元。

◇ 十二年内三次修改，创作自由从何谈起

《欧阳海之歌》在出版后短短十几年里，连续进行了四次修改。在修改了欧阳海与指导员闹矛盾的内容之后，江青又通过总政文化部谢部长传达她的指示，欧阳海牺牲前的心理活动那个段落必须改。这段内容许多老同志都比较赞赏，陈老总、陶铸同志都认为很好，没有再次修改的必要。陶铸同志明确地告诉作者：“不要一听到什么意见就改。今后关于这本书的修改，你要先通过我，你是我的兵，我说了算！”尽管有陈老总、陶铸同志的肯定，迫于政治的压力，金敬迈还是对小说作了修改。在欧阳海牺牲前的心理活动中，加进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又怕过于

突出个人，又加上了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修养》里面的两段话，起到了平衡的作用。作家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平衡不要紧，又被江青抓住了把柄。

作家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67年春天，在北京的京西宾馆。江青找他谈了一次话，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是训斥。江青对他的这次修改很不满意。一是说他小说的结尾，欧阳海牺牲前的那些情节，是苏联修正主义大毒草，影片《雁南飞》的翻版，二是谁指使他把黑《修养》里的两段话加上去的，江青怀疑是陶铸的指使，还说了许多陶铸同志的坏话。在作家的眼里，江青并不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文艺旗手，倒像是一个搬弄是非的长舌妇。三是作家由于引用了毛主席、刘主席的两个人的话，而且是同时引用，说他在搞两个司令部。这可把金敬迈吓出了一身冷汗。一个从话剧演员成长起来的作家，仅仅因为同时引用了两位领袖的话，怎么就成了要搞两个司令部呢。这次的修改，他删去了刘少奇同志的两段话，干脆把欧阳海牺牲前最后四秒钟的描写统统删去。

最后一次的修改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了。

1978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约作家对全书再一次进行修改。他勾掉了“林副统帅”的名字，这一点作家是通情达理的。六年前的那个秋天，这位“副统帅”早已灰飞烟灭了。作家再一次对“最后四秒钟”的情节做了完全符合原意的修改。令作家感到深深遗憾的是，关心过他的刘少奇、陈毅、陶铸等老一辈革命家都不在了。

◇ 沾小说的光进了中央文革小组，受江青的伤关进秦城监狱

仅仅因为一部《欧阳海之歌》，金敬迈从一位普通文艺战士、一位班长都没当过的小兵，一跃成为了中央文革小组文艺口的负责人，接管了文化部。如果金敬迈不进中央文革小组，不接管文化部，也许他就不会遭此十余载的厄运了。

1967年6月，金敬迈刚刚接管文化部不久，一位电影口的女同志向他反映，中国电影家协会资料室里，有不少涉及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界的资料，很多当年的报刊上刊有江青的照片。这位女同志原来就在影协资料室工作过，她反映，红卫兵进入这个协会后到处乱翻，他们也进入了影协资料室，说要翻阅当年的旧报纸，要从报上找《脱党启事》、《悔过声明》，抓出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叛徒。那位女同志担心红卫兵看到江青的照片，看到有关江青的资料，怕影响不好，有损于毛主席的声望。她建议先把这些资料收上来，金敬迈也同意了这种做法。可这一收，让红卫兵发现了怎么办？他们好奇心强，一定要问清为什么收？金敬迈心理也没底，真不知道这事该怎么办好。他就去请示戚本禹。两人正说话间，江青进来了，问金敬迈说什么呢。见到江青，金敬迈紧张起来。看来是搪塞不过去了，他只好吞吞吐吐道出事情的原委。本来是好心好意想办好事，生性多疑的江青竟通过谢富治的一张《逮捕证》，把作家一下子投入到秦城监狱。

从中央文革文艺口的负责人，一下子沦为阶下囚，从人生的顶端跌入人生的谷底，整个过程一共用了120多天。人生的落差如此之大！当时他的罪名是“搜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定性是“现行反革命”。作家被只透出一点光亮的铁窗一关就是2684天，走出高墙电网后，他依然没有获得自由，又被劳改了485天，好不容易获得自由了，又被挂起来733天。入狱、劳改、挂起来的时间加在一起，竟长达11年之久。令作家感到欣慰的是，这样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党的文艺政策十分宽松。让他欣慰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塑造的欧阳海这一艺术形象，没有被岁月的风尘所覆盖，欧阳海仍然是共和国亿万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

## 【史海钩沉】

### 文革中湖南几个红卫兵名人的故事

• 陈益南 •

那些不到20岁的青年人，尤其是那些追星族、超级网虫，在不少人的眼中，似乎他（她）们都还是小孩子，以为他们还不懂事。

其实，这仅是现在历史没给他们大机会而已，只要有舞台让其表演，年轻人都能演出一幕幕走进历史的大戏。

不说当年24岁的秦邦宪（博古）在中共危难之际毅然受命出任总书记、20岁的林彪就做了红四军军长、十八岁的肖华能担任红军少共国际师师长等故事，仅文革之中，很多20岁不到的青年，就俨然成为了一个个指点江山的政治家。很多“英雄”，确是“时势”所造。

#### （一）李X

李X是湖南文革初最大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的一号头头，时年不到20岁，是长沙市五中的高三学生。虽然，当时他不过是一个中学生，但由于其父为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加上他有一定组织能力，因而，在“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成立后，便被推举为“司令”。

由于李X生长在军区大院，对军队中的机构设置与礼节制度比较熟悉，因而他在统领“红色政权保卫军”后，便立即仿效军队建制，在“红色政权保卫军”这一组织内设立了诸如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保卫部、宣传部等机构。而且还将原省政协委员们驱走，占据了省政协大院作其总部，总部大院配置了身着军装的值岗卫兵（当然也是红卫兵），并向可以进出总部的人敬军礼。整个儿就俨然是一个军区司令部，能让所有到这儿来的人都生出惊异与敬畏。

总部之下，便是各学校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分部。李X给各学校一级“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定的名称也体现了军队味，他让各学校的组织叫“军分部”，不能称某某学校“红色政权保卫军”，而要称“红色政权保卫军”某某学校军分部。

李X还正儿八经地举行过一次“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的阅兵式，在市五中的大操场上，他让各学校“军分部”分别列队于操场，他则身着绿呢将军服并着白手套，站立于一辆无边斗三轮摩托上，由人驾驶缓缓在队列前前进，并互演军队中“同志们辛苦了！”与“为人民服务！”那套口号定式。

“红色政权保卫军”只存在了五个月，1967年初便被造反派打垮，周恩来总理在1967年的一次讲话中，指责了“红色政权保卫军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因而，它便顷刻瓦解，烟消云散。

李X当然心理是不服气的，可他老子是省军区副司令，知道被中央点了名这一事的性质严重，因此，李X就从此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台。虽然“红色政权保卫军”不少铁杆分子以后总想让“李司令”再登山重起，但终究没有成功。李X被老子送进了真正的军队，从一名战士做起，直至在1979年2月，以一个团职指挥员的身份参加对越反击战并荣立战功。

## （二）詹 XX

詹 XX 虽然作为湖南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在湖南文革史上是一位名人，但他本人的故事却并不很多。他原是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特冶系金属物理专业 661 班学生，做学生时就已是中共党员了。作为保守的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强大对立面，詹 XX 则担任了属造反派阵营的“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长高司）的第一号头头。

詹 XX 能被推举到由两万多名能说会道的大学生造反派红卫兵集聚的组织中担任一号指挥员，除了他的组织才能与当时颇为激进的造反观点之外，他所具有的中共党员身份，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当时，造反派们虽然要造党委的反，但偏偏他们又很希望自己的组织领导人没有“政治问题”，尤希望是中共党员为妥，以免被对方保守派抓“辫子”。

在与工人造反派组织一道摧垮“红色政权保卫军”等保守组织后，詹 XX 与其“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长高司）与工人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发生了严重政见分歧，结果在经过几个月复杂曲折的较量后，也步“红色政权保卫军”李 X 的后尘，被工人造反派组织打垮而基本退出湖南文革舞台。

是不是学生就注定只能象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能起“先锋”与“桥梁”作用，而不能长期担当政治领导人呢？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几大领袖如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等，毛泽东曾想培养他们做国家级的接班人，可是，观察了几个月后，毛泽东对他们失望了，得出的结论就是：“虽然你们今天能打倒别人上台，但，明天你们又会很快被别人打倒。”最后，弄得毛泽东只好派出军队去接管被蒯大富们一时掌管和学校。

学生或及纯粹的知识分子确有一个通病，就是行事总想索取“最好的”结果，而不是追求“最可能的”局面，缺乏对“度”的准确把握能力。文革中如此，1989 年学潮中也是如此。学潮发展到五月十二日时，学生运动的作为虽已很激进，所创民主氛围也很大了，但尚能为各方接受，可惜，“高自联”的头头们没能把握好分寸，一味仍只进不停。最后，事情由极端走向了反面，导至了悲剧的发生，已创民主的丢失。

詹 XX 在文革后进入了工厂，并一步步做到了湖南的一家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事长，至今。四人帮垮台后，很多人都以为詹 XX 会当上湖南省级的领导人，因为，文革中期，他作为造反派的对立面组织的一号头头，与其所支持的省委某些书记的关系不错，造反派垮台了，他应能出头了。他所在的那一派中有个盟友组织的头头刘某，在四人帮垮台时，确曾得意洋洋地宣称过：“现在该轮到高司的詹 XX 当中央委员、省革委副主任，而我也弄个省委常委当当的时候了！”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大概，詹 XX 虽说在文革中期保过一些省委领导，但他们的“保”与“红色政权保卫军”的“保”还是有区别的。“红色政权保卫军”要保的是整个党委及其领导，而詹 XX 与“长高司”所保的却只是那些支持自己组织的党委领导，若不支持自己组织，詹 XX 与“长高司”却是不会保的，相反还要打倒。例如，对当时支持工人造反派的章伯森（省委侯补书记）、华国锋（时为省委书记）等，詹 XX 与“长高司”则是定为要打倒的对象。毕竟，詹 XX 与“长高司”在文革初期是湖南造反派红卫兵的旗帜。

邓小平在文革后提拔做党和国家领导接班人的文革时大学生，如王兆国、胡锦涛等，都是文革中的所谓逍遥派，即基本没参加文革哪一派的人。这项国策正确与否，其实是大可研究的。一个没有经历曲折复杂政治活动洗礼的人，能否当好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其问号无疑是不小的。

但詹 XX 能做到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老总一级，则相当原因是他的才能所致，因他大学所学的专业就是冶金。

### （三）谢 XX（女）

时年仅十九岁的谢 XX 在文革初期的长沙，是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一则，她是湖南省唯一于 1966 年 8 月 18 日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在谢的笔记本上签上“毛泽东”题名的红卫兵；二则，她创立了敢闯敢造反的以中学生为主的“井岗山红卫兵司令部”，在文革中，二次领头封闭了省委机关报《湖南日报》社，从而二次掀开了湖南造反运动的高潮序幕。

谢 XX 出身于一个高干家庭，其父母都是湖南省厅级干部。照理，她本应是属于参加保守派红卫兵的对象。然而，文革初期，作为长沙市一中高中学生、并已是中共党员的谢 XX，却被驻学校的文革工作组打成了准“反革命”，被列入了工作组的黑名单。不知是谢 XX 的直言性格得罪了工作组？还是因谢的父亲由于属湖南省原中共地下党系统的干部遭“南下”干部为主的省委的排挤间接所致？反正，1966 年的 8 月，谢 XX 是被文革工作组整得只能跑到北京去告状了。

而，这一状不仅告灵了，伟大领袖都接见了她，并且，让谢 XX 更是开了眼界，接受了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观念熏陶。所以，她一从北京回长沙，就不仅不与保守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为伍，反而组建了一个专造省委市委反的中学生红卫兵“井岗山红卫兵司令部”。

在文革造反初期，工人出来造反还是不敢的，就算被单位领导打成了“反革命”、或“右派分子”，也只能心里不服而已。所以，当时的大学生红卫兵造反派“长高司”与中学生红卫兵“井岗山红卫兵司令部”这两个组织在湖南省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作为一个女学生红卫兵司令，敢作敢为且飒爽英姿的谢 XX，更给人一种魅力。

1967 年 8 月湖南武斗高潮之际，周恩来总理点名命令让进入湖南支左的 47 军军部派人护送时年仅 20 岁的谢 XX 上京，参加向中央汇报湖南文革情况的代表团。之后，谢 XX 成为了中央任命的、包括华国锋与解放军 47 军军长黎原在内只有十几个人组成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

1968 年省革委会正式成立后，谢 XX 却只做了一名省革委委员，而很多人都以为她至少应当省革委的常委，甚至当副主任也有资格。之所以如此，一则是工人造反派代表已成了当时的左右时局的力量，作为中学生的谢 XX，其份量已不太为主湘的 47 军军部重视；二则，是由于谢与当时受整的极左派红卫兵头头们（均为大、中学生）有一些私人友谊性往来，受到了牵连。

1970 年，谢 XX 在受到一连串的审查后，她进了工厂，当了一名工人。1974 年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与 1976 年的批邓反右运动中，很多造反派工人都希望尚只二十多岁的谢 XX 重出江湖，但她终于忍住了，安心当她的工人，并读书求学。

因而，由此她得以在四人帮垮台后，没有陷入其他那些当年的造反战友们所受的挨整境地，相反利用恢复高考的机会，接受了高等专业教育，从而具备了一名电脑工程师的资格。

现在，谢 XX 是一家大型电脑软件公司的老总，虽然，此时她在 IT 业的名声远不如她当年

做红卫兵司令时响亮，但她却绝对是活得很有质量，且有滋有味。

2 0 0 2 / 5 / 3 1

~~~~~

【亡灵祭坛】

3 8 条士兵的生命——“珍宝岛”事件余波

· 佚 名 ·

1 9 6 9 年 8 月 1 0 日，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到塔城军分区检查工作，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汇报工作时谈到最近对面苏军调动频繁，夜间可听到坦克的轰鸣声，苏军是否有什么阴谋？任书田副司令员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新疆军区司令部。8 月 1 1 日，中国军队在两国边防军经常会晤的巴克图哨所悬挂起红旗，这是邀请对方司令官进行会谈的信号。然而，红旗悬挂了一天，苏军的赫尔丘上校、安泽菲洛夫中校、巴什捷夫中校，谁也没有露面。

8 月 1 2 日，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接到塔城军分区再次来电，认为苏军行动反常，马上报告了龙书金。龙书金弃置一旁，没有答复。当晚，王新光政委又电话直要新疆军区作战值班室，报告当面苏军可能有重大的行动。请示明天的例行巡逻可否取消。值班参谋回答：军区首长已接到你们的报告，但对取消例行巡逻一事没有明确指示。8 月 1 3 日上午 8 时，按照规定，副连长杨政林率领三排 3 7 名官兵，执行例行巡逻任务。王新光政委立在一个高地上，目送巡逻队消融入茫茫的戈壁滩。虽然这天的阳光格外明媚，王新光的心头却笼罩着驱之不散的浓厚的阴云。巡逻队的官兵对即将发生的凶险茫然不知，他们沿着例行的巡逻道路，逶迤着向前走去，由于是在荒无人迹的戈壁上巡逻，所以队形并不很严整。几个刚到边防的新兵。围着杨政林听他讲惊心动魄的边防斗争故事。还有的将路旁的沙枣棵、骆驼草折断，编成圈帽戴在头顶，以遮挡骄热的太阳。突然，杨政林停住了脚步，他似乎感到周围的地形有些陌生。这条路他走过上百遍。沿途的一草一木、山丘、沟壑，他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指掌。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地貌，说不出哪里感到别扭。

一望无际的戈壁，犹如一个正在酣睡的莽汉，毫无知觉的袒露着胸腹。杨政林正要命令巡逻队继续前进，一发炮弹挟着尖厉的呼啸落在队伍的中间。“轰”的一声巨响，五六名战士炸得四散飞进。“卧倒”，杨政林吼叫着发出了命令。6 辆苏军坦克犹如从地狱里钻出来，出现在杨政林的视野里，它们巨兽般摇晃着抖掉身上的浮土、草棵，成扇形从三面包围上来。三百多名苏军官兵，也从土堆里爬出来，尾随坦克开始冲击。杨政林这才意识到，这是苏军周密计划，蓄谋已久的行动。巡逻队被四面包围，已经没有生还的退路了。

此刻，杨政林已抱定必死的决心。抵抗，无异鸡蛋往石头上碰，可即便头破血流，也要溅它一身黄了。望着呐喊冲来的苏军士兵，杨政林对身旁的机枪手狠狠挥动了一下手臂，“打！”机枪手也意识到处境的险恶，紧抱着机枪，将一串串子弹，刮风般扫向扑来的敌人。巡逻队的战士，虽然伏在地上，但无可依托的地物，且被苏军的密集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间或用冲锋枪还击一下，子弹打在坦克的甲板上，只是迸发出几粒火星，对敌军根本构不成威胁。此时杨政林的左臂已经被子弹射了个洞，他无暇包扎，不断涌出的血水染红了半边军衣。现在，他知道自己应该先做些什么了。他将报话机从已牺牲的报话员的身上解下来，大声呼叫：“塔城、塔城，我是杨政林，我们在铁里克提东 10 公里处遭敌伏击，苏军坦克 6 辆，步兵 300 余人……”这时，空中传来“嗡嗡”的轰鸣声，杨政林抬头，看到两架直升机，在头顶盘旋两圈，然后向北折去。

杨政林报告完敌情，最后沉重他说：“请党相信我们。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粒子弹，决不会出现一个俘虏……”杨政林扔下话筒，用冲锋枪扫倒几个苏军士兵。正想转身射击，这才发现右腿被炸断了，早已失去了知觉，血水浸透了身下的岩石。苏军似乎知道了这一队中国士兵目前处于的孤立无援的境地，马上改变了战术，不再用坦克导引步兵冲击，而是将中国士兵团团围住，用准确的炮火逐个进行打靶式的射击。巡逻队马上陷入了拼杀不能，抵抗无望的境地。空旷的戈壁变成了血腥的屠场。有的中国士兵早已死去，仍然成为苏军射击的目标，尸体上冒着一缕缕中弹后的青烟。中国士兵抱定必死的决心，依然顽强地抵抗着。突然，两颗汽油燃烧弹在中国阵地中间炸裂开来，随着四散喷溅的黑色液油，大火如噬人的野兽张开了血红的嘴巴。火海里，中国士兵在翻滚、扑跌。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伴着血肉被烧焦的腥臭味，在苍茫的戈壁滩上飘散，回旋……。汉存的两名伤兵爬到了杨政林身边。7班长胡宝杨右眼被击穿，血浆糊了一脸。新战士小王第一次参加执勤，连枪都不会使，手里紧握着一颗未开盖的手榴弹，稚气的脸颊上挂着横七竖八的黑红的血污。他的腿、腹、胸先后中了4弹，军衣与皮肉烧结在一起连扔手榴弹的力气都没有了。杨政林悲叹了一一，回身望了一眼祖国的土地，缓缓旋下小王手中的手榴弹底盖，攥住弦扣。一声巨响过后，阵地上旋即沉静下来。只有滚滚的黑烟，还在升腾、膨胀，远远望去，如一只狰狞可怖的恶鬼。等到中国陆军第八师的一个团携带轻重武器，从60公里外的巴克图据点赶来时，战斗早已结束了。38具尸体弃置一地，有的面目全非，变成了黑炭。方圆几百米的戈壁，仿佛被炽热的开火焚烧过，变得漆黑一片。大漠孤烟，夕阳惨照，天将倾，地欲堕，黄昏血色，血色黄昏。

半个月之后，为了弄清事件真相，中央军委调查组来到了乌鲁木齐，先后调查了司令员龙书金、政委王恩茂、副司令员赛福鼎以下近百人。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参谋长南仲周认为，事件发生前，苏军调动频繁，情况异常，这些情况多次向军区司令部值班室汇报过，现有电话记录可以作证，汇报中曾多次要求暂停巡逻，但上级都没有答复。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说：“接到塔城军分区的报告后，我们是慎重研究过的，并且有情况不明暂不巡逻的决定，但上报军区后，一直未接到批复，不得已只好让值勤分队继续巡逻，为了此事，赵副司令员曾亲自打电话找到龙书金，并且吵骂了一通。”新疆军区作战部科长宫为友、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岳耀礼说：塔城上报的情况我们都已知道，作为参谋人员，我们也同意暂停巡逻，但是给领导汇报后，确没人理睬。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说：“为此事我曾专门请示过龙书金司令员，司令员让我报告北京外交部，让他们拿意见。由于事关重大，在外交部没有明确答复前，我不敢擅自下令停止巡逻。”关于一个边防哨所是否巡逻的问题，居然要由远隔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负责。这实在有点滑稽，再查北京外交部，外交部答复值班人员已回电，关于边防部队的巡逻间隔，巡逻路线，可由新疆军区自行确定。从北京到新疆，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究竟谁应该为“8.13”事件负责呢？鬼知道？

直到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这些纠缠不清的失误才一古脑落到林彪死党龙书金的头上，龙书金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否也暴露了当时军队内部分工不明，遇事推诿，相互扯皮、缺乏决断的弊端呢？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